



反击右倾翻案风 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湖南人民出版社

统一书号:7109·1076

定 价: 0.21 元

反击右倾翻案风 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衡阳地委宣传部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反击右倾翻案风
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中共衡阳地委宣传部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 85,000册

统一书号：7109·1076 定价：0.21元

毛主席语录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语录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出 版 说 明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发展，乘胜前进。我省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最近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牢牢地掌握批邓斗争的大方向，坚持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通过学习和批判，促进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发展。

这本集子收集的十几篇文章，反映了衡阳地区教育战线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深入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大辩论的初步成果，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这个地区各类学校认真学、深入批的经验，展现了战斗在教育阵地的同志们同仇敌忾，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誓与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斗到底的风貌。他们把学习摆在首位，领导成员坚持做到先学点、多学点、学深点，以实际行动带领群众，认真地学习革命理论，掌握批邓斗争的思想武器；为了学得深，批得透，他们联系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一个一个专题地读书，一个一个专题地调查，一个一个专题地召开理论学习和批判会；他们还针对各类学校

不同特点，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学习和批判。

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批深批透，还得进一步下功夫，花气力。通过斗争和批判，搞好教育革命，还有待我们的进一步努力。“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存在的现象，与走资派作斗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战斗任务。因此，我们要牢固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六月

目 录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中共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委员会（1）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

——衡阳市七中四年级理论小组专题学习批判会纪实
……………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通讯组（12）

唯生产力论是“智育第一”的理论基础

……………衡东县第一中学党支部（21）

学习《矛盾论》 批判折中主义诡辩论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组（29）

“七·二一”道路不容否定

……………中共衡阳探矿机械厂委员会（37）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学校

——驳“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
……………衡阳市十中工宣队（43）

否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就是反对农村教育革命

……………衡阳市长湖公社一中贫管会（48）

反复学习《实践论》 深入批判攻击开门办学的谬论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工农兵学员 刘智明（55）

贫下中农的鉴定 对“今不如昔”论的有力批判

.....衡南县一中党支部 (61)

列宁的教导不容篡改

——学习《青年团的任务》的一点体会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党支部 (68)

鼓吹“智育第一” 就是篡改党的教育方针

.....祁阳县大村甸区中学党支部 (75)

做普通劳动者 永远与工农划等号

.....衡阳医学专科学校七五级工农兵学员理论小组 (81)

革命一辈子 改造一辈子

——斥邓小平反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奇谈怪论

.....衡阳医学专科学校理论组 (88)

学习鲁迅 全盘改造旧教育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教师 刘铭璋 (96)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
共产党内”的重要指示

中共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委员会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联系党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联系教育战线的斗争实际，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指示，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二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党内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革命斗争的重点，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路明灯，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搞好教育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

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为什么存在资产阶级？对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是不太理解的。通过深入学习和讨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我们觉得并不奇怪，它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列宁一九〇九年在《取消取消主义》一文中指出：“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毛主席也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是正常现象。”用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来观察和分析我们的党，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把党看成绝对的纯是不合乎事实，不合乎辩证法的。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存在走资派，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经济基础。

我们的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党一成立，就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这种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无产阶级不仅有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且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也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特别是由于我们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长期战斗在广大农村，处于被敌人分割的环境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个无产阶级政党必然要经常地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打交道，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有大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革命队

伍，有的还加入到我们党内来。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当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以后，能够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是另一部分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虽然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我们党的最低纲领，但并不准备实行党的最高纲领。他们“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他们只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了，他们就认为革命到了“尽头”。当革命继续发展到要消灭资产阶级及一切剥削阶级时，他们便格格不入，甚至加以反对，由党的“同路人”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这种人当了权，就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发展，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被剥夺，在政治、思想上处于被统治、被改造的地位。但是，他们人还在，阶级还在，时刻梦想恢复失去的“天堂”。那些在旧土壤上产生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具有无比贪婪的特性，更是疯狂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都深深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特别是当他们在政治上屡遭失败，名声已经越来越臭的情况下，想要公开聚集起来向无产阶级进攻就更加困难。因此，他们越来越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身上。而我们党内那些思想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愿继续前进的人，那些意志薄弱，在资产阶级糖弹袭击下蜕化变质的人，也就适应这种需要，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

政治代表。他们一旦掌权，便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里应外合，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党内出现资产阶级，除了上述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以外，还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在我国，这种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法权存在，党内外都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那些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就会通过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通过某种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来占有他人的劳动，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成实际上是由走资派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把人们的社会主义相互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弊病”，正是党内资产阶级和走资派赖以存在和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

我们在分析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根源时，还认识到，党内产生资产阶级与教育事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苏联产生大批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把学校变成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了一大批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苏联叛徒集团的头目、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勃列日涅夫之流，大都是通过这种学校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也正是这些人，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把列宁、斯大林开创的革命事业白白葬送了。我国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一伙走资派把持教育大权，教育制度不仅“基本照旧”，还“全盘苏化”，妄图把青年学生引向“读书做官”、

“成名成家”的邪路，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因此，坚持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彻底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防止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方面。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

为什么说党内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认识到走资派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核心力量和挂帅人物。

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党内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要首先抓住这个特征，从本质上看到，走资派是党的一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他们是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为共同基础的。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手中就掌握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在政治上抛出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纲领，强加于党和人民。在组织上，他们拉山头，搞宗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经济领域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腐蚀人民群众，瓦解

革命斗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思想文化战线，他们大力兜售封、资、修的黑货，大造反革命舆论，反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阵地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就是因为刘少奇一伙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走资派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搞起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更厉害，因而对革命的危害也就更大。

党内走资派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他们或者把自己装扮成正确路线的拥护者、执行者，援引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接过革命的口号，阉割革命的灵魂，塞进修正主义的私货；或者把自己打扮成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蒙蔽和诱骗人们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王明不就是装扮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来吓唬人吗？彭德怀不就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来反对三面红旗吗？刘少奇不就是一贯吹嘘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林彪不就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吗？邓小平玩弄的也正是这种欺骗伎俩。他打着全面贯彻毛主席指示的旗号，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阶级斗争，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在他的指挥下，教育界的走资派放出种种奇谈怪论，蛊惑人心，欺骗群众。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明明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他们却别有用心地说成是“文化低”、“不读书”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他们明明要取消党对教育的领导，

却说什么要“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他们明明要搞“智育第一”，却说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如此等等。我们只有充分认识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深入的批判，才能保卫我们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胜利。

总之，党内走资派作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新老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反映了一切反动阶级的复辟愿望。他们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互为依存，互相呼应。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是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基础，他们是社会上阶级敌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靠山。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看到社会上老的资产阶级还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在产生，尤其要看到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有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走资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明确认识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才能保证同社会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战略思想

在学习讨论中，有的同志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既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走资派，会不会改

变我们党的性质？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认真进行研究。

列宁教导我们：“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到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党内占据着统治地位。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都集中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获得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广大党员和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人心、党心、党员之心是要求继续革命，反对搞修正主义，反对复辟倒退的。由于这些因素在党内起着支配的决定的作用，尽管党内存在资产阶级，并没有改变我们党的性质。但是，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不正确，不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让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让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党和国家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列宁亲自缔造的党蜕变成修正主义的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就是沉痛的教训。

毛主席根据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学说，采取了

一系列反修防修的有效措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胜利前进。实践证明：要保证我们的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关键问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挂帅人物，同走资派进行坚决的毫不调和的斗争。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的党，历来就是在同党内机会主义不断作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夺取政权以前，陈独秀、王明等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曾使革命事业几次遭受重大损失，但当我们对他们进行了斗争，批判了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党就转危为安，战胜了强大的阶级敌人，从失败走向胜利。解放以后，不管帝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也好，党内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尽管中央出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头子，他们不但没有搞垮我们，相反，经过斗争，我们的党更加光荣、伟大、正确，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更加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就可能出修正主义；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看来，这种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要一直斗下去，一直斗到阶级消灭，斗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只有经过斗争，特别是经过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才能揭露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庞然大物”，摧毁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在斗争中更

好地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也只有经过斗争，才能培养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质，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向共产主义迈进。

总之，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阶段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我们必须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战略思想，把同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的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斗他二十次，三十次，永远斗，只要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就要战斗。教育战线也要如此。学校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封、资、修的流毒既深且广。几千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做官”、“知识私有”、“个人奋斗”之类的剥削阶级思想虽然受到批判，但是并没有彻底肃清，遇到风吹草动，容易死灰复燃。大量的知识分子还没有改造好，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所有这些，使得学校容易成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肥沃土壤。党内走资派总是妄图利用这块土壤培植复辟势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刘少奇就是这样做的；去年夏季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又是妄图从这里打开缺口；今后党内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同样不会放松教育这块阵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斗争，必定会要长期地进行下去。我们决不可以松懈自己的斗志，既要看到斗争后的胜利，更要看到胜利后的斗争。只有深刻认识这一点，始终坚守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坚持不懈地同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斗下去，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

底。

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一重要指示，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性质和意义，提高了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自觉性，加深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们认识到，同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长期战斗任务。我们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牢记党的基本路线

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

——衡阳市七中四年级理论小组
专题学习批判会纪实

衡阳市七中党支部和工宣队，为了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引向深入，在前段学习和批邓的基础上，组织全校师生专题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实行开门学理论，组织十九个班成立四十五个调查组、二十八个小分队，深入到六个工厂、七个大队、六个居委会，调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是怎样不甘心死亡的，小生产是怎样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旧的传统观念和小生产的影响是怎样腐蚀我们革命队伍的，社会上的阶级敌人是怎样与邓小平遥相呼应的，校内外的阶级斗争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请老工人、老贫农、老干部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课，与工人、贫下中农一起学习，一起批判。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大激发了师生的无产阶级感情，丰富了他们的阶级斗争知识，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指示加深了理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深入

批判了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

下面就是该校四年级理论小组一次专题学习、批判会的纪实。

大量事实说明阶级斗争没有熄灭

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阶级斗争到底熄灭了没有？没有。

学生刘健朴在批判中说：我们调查的大量事实说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就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个地主分子，趁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机，写了一首反动诗，同邓小平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这也“搞错”了，那也“搞糟”了，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这个地主分子在反动诗里，就诬蔑大好形势是“时难年荒”；邓小平叫嚷还乡团“好得很”，复辟“好得很”，这个地主分子就狂叫“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思乡处处同”。他“思乡”，就是想“还乡”，就是要复辟。可见，邓小平和地主资产阶级是一个鼻孔出气，走的是一条路子。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革命群众狠狠批斗了这个地主分子，有力地打击了阶级敌人梦想复辟的反动气焰。

学生叶恒说：通过调查，我们深深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倾向严重地存在，小生产在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

有个集体单位，一个油漆工打着集体的招牌搞家庭包工，全家六口人一齐出动，用非法得来的货币，买了一栋房子，装饰得象地主、资产阶级的别墅一样。这种情况，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狠斗资本主义。这个单位的党组织，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没收了他非法攫取的财物。

教师万竞西说：由于封、资、修的影响严重存在，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大量存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复杂。就拿教育战线来说，解放以来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表现得很突出。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但是剥削阶级旧教育的传统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广大革命教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并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然而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现在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其世界观还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容易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这就告诉我们，由于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大量存在，是坚持还是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这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我们师生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切切不可忽视。

学生王惠英在批判中说：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到处都有。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个党员，曾经盗窃木材，做板车高价出售、出租，搞地下运输。受到组织处分以后，

他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越陷越深。他与一些投机倒把的人互相勾结，非法占有大量的商品和货币，过着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他盖了一栋大楼房，自己住不完，就出租给别人，索取高额租金。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广大职工群众对他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又进行了批判，党组织进一步对他进行了处理。这个党员蜕化变质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小生产的影响，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学生杨平批判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十分激烈，我们与刘、林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惊心动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说阶级斗争熄灭了，他们自己就从来不熄灭。刘少奇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要在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林彪炮制反革命《571工程纪要》，要打倒无产阶级，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啊！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重新工作以后，又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妄图继续推行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他为总后台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竟然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公开叫嚷要他当反革命政变的头子，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这难道不令人惊心动魄吗？阶级斗争哪里熄灭了呢！

四年级年级组长、数学教师夏经天说：事实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地主资产阶级要复辟，无产阶级就要反复辟。

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要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就必然在党内寻找代理人，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坚持搞资本主义，危害极大。因此，走资派是现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些人掌握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打着红旗反红旗，搞起资本主义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厉害得多，危险得多。所以，党内走资派是我们斗争的重点对象。毛主席教导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坚持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进行坚决的长期的斗争，才能保证同社会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斗争的胜利。

“熄灭论”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邓小平为什么闭着眼睛说瞎话，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呢？

学生沈春花联系苦难的家史批判说：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阶级斗争。他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叫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解放前，广大的劳动人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那时，我爷爷、大伯给地主当长工，姑姑给地主做佣人，当牛做马，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一

九四二年，我家揭不开锅，奶奶、姑姑和大伯被活活的饿死了，剩下的五个人，就靠我爷爷一人来维持生活。怎么活下去呢？十二岁的爸爸被迫给地主做童工，受尽了折磨。解放后，我家也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翻了身。这些，全靠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全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靠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妄图使我们的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要同他斗到底。他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坚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学生黄爱平说：邓小平口里讲**阶级斗争熄灭**，实际却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他所说的熄灭，就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欺骗麻痹人民，不去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出了新老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心里话，代表了党内外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愿望。

有个学生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批判说：阶级斗争熄灭论确实是一种麻醉剂。这种麻醉剂，曾经麻痹了我，使我上过当，吃过亏。过去，我错误地认为，如今到处是新人新事新气象，自己又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出身工人家庭，等于进了“红色保险箱”，思想上放松了警惕，给阶级敌人钻了空子。一九七三年，社会上一个坏家伙引诱我看黄色书籍，唱黄色歌曲，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差点把我拉进了资产阶级泥坑。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教导，和老师、同学一起搞社会调查，

同时，重温自己家史，忆苦思甜，批判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受到了深刻教育。我爷爷、父亲在旧社会被迫给地主、资产阶级当奴隶的悲惨生活，使我认识到：老一辈翻身得解放，靠的是推翻三座大山的阶级斗争；我们新一代要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得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根弦松不得。今后，我要牢记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的风浪里锻炼成长。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理论小组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认识到要与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切实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学校。

工宣队员胡兰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工人阶级必须永远占领、彻底改造教育阵地。几千年来，教育阵地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进驻学校，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一统天下。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宣队充分发挥政治作用，使学校斗、批、改运动不断深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占领与反占领、改造与反改造、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还在继续。我们工宣队员决心牢记毛主席的“七·二七”指示，在学校长期留下去，用

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教育阵地，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学校，把学校真正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学生聂林海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狠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使我深刻认识到，要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做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必须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资产阶级为了搞复辟，疯狂地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少年，除了用“四旧”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进行腐蚀外，还散布“读书无用”、“变相劳改”等谬论，把一些在校学生拉出学校，企图瓦解无产阶级教育阵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了打好同资产阶级争夺青少年的这一仗，我们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全校师生一齐上阵，与社会、家庭紧密配合，进行阶级教育，狠狠批斗了教唆犯，使那些中途离校的同学返回了学校，有的还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积极分子。事实证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教师万竞西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要在教育阵地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我们革命教师就要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深刻体会的。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我只想成名成家。当教师以后，我又想，自己没有成名成家，可以培养学生成名成家，还是用“个人奋斗”、“读书做官”那一套教学生。修正主义教育真是害死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使我清醒过来，认识到修正主义邪路走不得，跟着资产阶级走是没有出路

的。我下定决心，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深入工厂、农村开门办学，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党组织和群众看到我的点滴进步，不断鼓励我，连续八年把我评为先进工作者。实践使我深深体会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只有在这个转变上下功夫，才能逐渐地站到无产阶级这一方面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作出贡献。

党支部委员、革委会副主任蔡立成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特别要树立与党内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我们通过社会调查和参加阶级斗争实践，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加深了理解，并用调查的大量事实，驳斥了邓小平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我们决不可松懈自己的斗志，要努力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树立与党内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我们教育战线要乘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这股强大的东风，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师生的思想革命化，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邓小平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们就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在衡阳市七中，一个认真学、深入批、同修正主义对着干的群众运动新高潮正在形成，教育革命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前进。

（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通讯组）

唯生产力论是“智育第一”的理论基础

衡东县第一中学党支部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极力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是新老修正主义者惯用的臭名昭著的反革命理论。这种“理论”，是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在教育界鼓吹“智育第一”的理论基础。彻底揭露和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铲除新老修正主义者推行“智育第一”的理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划清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这对于我们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教育革命，把学校真正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疯狂叫嚷：“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得“发展生产力”。他还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论述，说什么“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要发展“科学”，就要“读书”，“提高教育质量”。邓小平从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大肆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胡说现

在学校“主要危机是学生不读书”、“不讲学文化”，“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因而他就要“扭”转教育革命的方向，复活“智育第一”，复辟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这就明显地看出，邓小平完全是以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作为理论基础来鼓吹“智育第一”的。

鼓吹唯生产力论，这并不是邓小平的新发明，国内外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历来都是如此。早在四十年代，苏联修正主义教育学家凯洛夫抛出“智育第一”论的时候，就是以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鼓吹的唯生产力论作为理论依据的。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取决于无产阶级革命，而将取决于“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只要生产力高度发展了，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考茨基胡说社会主义就是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声称无产阶级主要任务就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托洛茨基、布哈林则认为，苏维埃国家已跨进了“经济时代”、“生产时代”，他们提出“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凯洛夫在他的《教育学》中，从这种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出发，极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宣扬“智育第一”。他诡称：“适应着苏联经济改革，苏维埃社会的阶级结构也改变了，剥削阶级不复存在了”，“教育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了，教育只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而要发展生产力，只须掌握人类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就行了”，因此教育中，“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以系统的知识来武装学生”。从凯洛夫抛出“智育第一”论，到邓小平声嘶力竭地兜售这号黑货，时隔三十年，然而，不但他们的理论

同出一辙，就连他们的语言也是一个调。

修正主义者鼓吹唯生产力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所要的教育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为着隐瞒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质，总说什么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它教的是“一般科学”。列宁尖锐地指出：“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们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修正主义者为了欺骗群众，也总是把浸透了资产阶级阶级精神的教育，涂上超阶级的色彩，打出“智育第一”的幌子，为在学校搞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打掩护。邓小平为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领域里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并把这种反动理论推行到教育领域，接过老牌修正主义者的衣钵，重新扯出“智育第一”的破旗，竟至几次催促教育部的那个走资派说：“你是教育部长，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但是，演说又有什么用呢？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群众面前，越演越说，就越是暴露了邓小平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二

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判邓小平时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

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邓小平搞修正主义的反动本质。邓小平极力抹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抽掉“现代化”的阶级内容，鼓吹唯生产力论，抽掉教育的阶级内容，鼓吹“智育第一”，其实质就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邓小平开口“一切为了现代化”，闭口“一切围绕四个现代化转”，他要的到底是哪家的现代化？现在世界上，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有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是实现了，但它给无产阶级带来的却是贫困化！我们与邓小平的根本分歧，不是要不要搞现代化，而是按照什么路线，搞哪家的现代化。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毛主席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完全消除旧社会的痕迹，生产关系还有不完善的方面，在上层建筑里仍然存在着不少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东西。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邓小平极力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照之办理，资产阶级法权就会无限地膨胀，资本主义就会泛滥成灾，老资产阶级就会卷土重来，新资产阶级就会一批又一批大量产生，党内走资派就会全面篡夺党和

国家的权力，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那么，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日，正是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之时，也许国名还没有改，而我们劳动人民却已重新陷进受剥削受奴役的苦难深渊。这样的现代化，不正是苏联人民已经饱受其苦的东西吗？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把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都“化”掉了吗？何况，现在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也不容许按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建立独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修正主义必然是卖国主义。用修正主义的路线搞现代化，只能使中国沦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

邓小平从唯生产力论出发，抹煞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拚命叫嚷学校“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大肆鼓吹“智育第一”。在他看来，学校搞“智育第一”，就有科学，有技术。毛主席在谈到美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时深刻地指出：“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如果按照邓小平的“智育第一”搞教育，回到“十七年”的老路上去，用“读书做官”、“知识私有”、“成名成家”去腐蚀学生，这样，学生即使掌握了科学技术，不会也不可能用来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服务。旧学校出现的“知识到手，人被夺走”的触目惊心事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从前有人唱：“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现在不是也有人说，有了知识和技术，是“打不破的铁饭碗，没收不了的活财产”吗？毛主席指出：“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邓小平鼓吹“智育第一”，就是妄图诱使学生走白专道路，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我们只有对此进行彻底揭

露和深入批判，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才能使学生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使教育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能改变一切”。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在学校要提高我们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

邓小平装出一副关心生产、关心教育质量的悲天悯人的样子，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那里捡来一些唯生产力论的破烂当作法宝。其实，这些破烂早已被革命人民批得体无完肤，是不值一驳的陈旧货色。

邓小平抛出的头一件破烂，叫做“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列宁教导我们：“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又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岂止是生产搞不上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要遭到破坏。我们只有狠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政治统帅业务、革命统帅生产，才能搞好生产和各项工作。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

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邓小平出于资产阶级本性，十分阴险地妄图叫人们埋头生产，埋头业务，埋头读书，放松革命警惕，以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他刮的“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台风”。“把生产搞上去”，“把教育质量搞上去”，这个上，那个上，都是假的，让资产阶级上台才是真的。

邓小平抛出的第二件破烂，是“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推行到学校，就是要“分数挂帅”，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他这一套，完全是从苏修那里搬来的，完全是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勃列日涅夫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咒骂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行政方法盛行”，使经济核算“徒具形式”。与之相比，邓小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恶毒攻击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是“妨碍科研、破坏科研”，咒骂政治学习是“苛捐杂税”。我们知道，说“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生产的积极性，那完全是鬼话，它刺激出来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雇佣观点，使人们变成不惊扰资产阶级安宁的资本的附庸；它刺激出来的只能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其结果，必然会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破坏社会生产力。在学校搞“分数挂帅”，引诱学生拚命去追求那个“百分”，爬那个“宝塔”，把阶级斗争、国家前途、人类命运统统置诸脑后，思想被腐蚀，身体被摧残，才能被束缚，这样的教育，对无产阶级是个祸害。“十七年”旧教育给我们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邓小平抛出的第三件破烂，叫“专家治厂”。推行到学校，则是“教授治校”，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叫做“要有热心科学

的外行来领导”。他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但是，在邓小平的眼里，工农兵是“一不懂行，二不热心”，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有知识，只能让他们来治厂、治校。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我们把工厂的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吗？不是要使学校又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吗？可见，邓小平叫嚷要由“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群众参加企业管理，反对工人阶级、反对贫下中农领导和管理学校。

总之，邓小平鼓吹的唯生产力论和“智育第一”论，实际都是复辟倒退论，他所要走的完全是一条走不通的资本主义老路。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理论基础，广大干部、群众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飞跃发展，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蒸蒸日上，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繁花似锦。斗争实践告诉我们，“**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民总是要革命的。不管邓小平施展什么伎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将永远前进。

学习《矛盾论》 批判折中主义诡辩论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政教组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学习《矛盾论》，用唯物辩证法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折中主义诡辩论，对于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击退右倾翻案风的猖狂进攻，捍卫和发展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邓小平就是用折中主义手法，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阶级斗争，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在教育战线，他声嘶力竭的叫嚷，“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的成绩”，他摆出“哲学大师”的架势，说什么“对十七年”的教育“也要一分为二”。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

运动和变化。毛主席把这个规律通俗地叫做一分为二。的确，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我们对任何事物都应该一分为二。问题是怎么分，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立场，还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是对事物进行客观分析，还是随心所欲地主观臆断。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现在的客观实际是什么？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我们正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两大对抗阶级斗争的焦点，反映到党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定一切的。面对这个客观实际和基本事实，我们一分为二地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首先就要分阶级、分路线，就要看到在十七年教育领域里，同样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过去十七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占据着统治地位。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在十七年教育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既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就决定了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只有这样一分为二地看教育，首先分阶级，分路线，我们才能抓住本质，看清邓小平所谓“十七年”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修正主

义教育路线评功摆好，扬幡招魂。

怎样看“成绩”？也要一分为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标准。过去资本家办工厂，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榨取得越多，办工厂成绩就越大。可是，资本家的成绩越大，对我们无产阶级的剥削就越多，对资本家是福，对我们无产阶级就是祸。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按照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需要，从教育制度到教学方针和方法，无不浸透了封、资、修的毒汁，学生在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即使工农子女也被“化”得“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这对资产阶级，当然是“很大成绩”，可是对我们无产阶级，这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青少年，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滔天罪行！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的科学。它只能为无产阶级运用，而不能为资产阶级所用；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邓小平从反动立场和唯心主义出发，不问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不管这个矛盾的哪个方面占支配地位，也不分教育是什么阶级性质，硬要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十七年”教育中，分出成绩与缺点的矛盾来，分出“也有很大成绩”来。这完全是折中主义的诡辩论。他在这里，要的是偷梁换柱的鬼把戏，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相去十万八千里。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折中主义比机会主义更有害，因为它“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替机会主义的实践辩护，用一连串的诡辩来证明革命行动的不合时宜等等。这个理论的著名代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权

威考茨基，就是头号伪君子 and 糟踏马克思主义的能手。”邓小平为了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十七年实践所造成的恶果辩护，也不惜搬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分为二”，揭穿来看，他并不是什么“哲学大师”，同样是头号伪君子 and 糟踏马克思主义的能手。

二

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我们正在逐步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正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他攻击我们“不全面”，“只要劳动者”、“不要学文化”、“丢了智育”，“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从表面看，邓小平似乎很“全面”，实际上，他是借“全面贯彻”之名，行全面篡改之实。

什么叫“全面”？什么叫“不全面”？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我们对客观事物一分为二时，并不是把多种矛盾等同看待，也不是把矛盾的诸方面平分秋色，等量齐观，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重点和一般、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分为主流和支流、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这就是说，在坚持两点论的同时，必须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只有抓住重点，统帅全局，才能收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效果。所以说，抓住了重点就是抓住了全面。如果象折中主义那样，左一个“一方面”，右一个“另一方

面”，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把这叫做全面，那就会主次不分，“眉毛胡子一把抓”，“丢掉了西瓜抓芝麻”，或者什么也抓不住。毛主席提出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正是辩证法关于两点论的重点论这一基本观点的光辉体现。它要求社会主义学校把无产阶级的德育放在首位，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要求“**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才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因此，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坚持德育统帅智育和体育，而不是把它们并列，更不能本末倒置。必须通过德育的统帅作用，促使并保证学生在智育、体育方面的发展，从而“**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如果离开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奢谈什么“科学”、“文化”，教育工作必然迷失前进的方向。

邓小平要的“全面”，同我们说的全面完全相反。他把事物的许多矛盾和矛盾的各个方面机械地加在一起，不谈每个矛盾和矛盾每一方面的特定地位，否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就完全背叛了唯物辩证法，滑进了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泥坑。

邓小平真要“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吗？不是，绝对不是！他是打着“全面贯彻”的幌子，一股脑地把德育、智

育、体育罗列在人们面前，大发谬论，说什么当前的主要倾向是“政治冲击业务”，学生“不读书”、“文化低”是“最大危险”等等，用以混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界限，偷偷地把辩证法的重点论抽掉，用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取而代之，贩卖“智育第一”的黑货。“智育第一”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第一，他的阴谋一旦得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就要变质。可见，邓小平叫喊“全面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假，妄图全面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真。

三

邓小平诬蔑我们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是“矫枉过正了，过正总不是正”。

“过正总不是正”，从来就是机会主义反对革命的理论。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对这种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主席说：“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它“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邓小平在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公然对抗毛主席对这种反动谬论的批判，捡起老机会主义者反对农民运动的陈旧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和当年攻击农民运

动“糟得很”的地主阶级一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群众起来革旧教育制度的命，视为洪水猛兽，对教育战线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横看不顺眼，竖看不称心，大喊大叫“今不如昔”了，要赶快来一番“整顿”，妄图把教育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打下去，恢复旧的教育制度，重新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什么是“正”？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旧教育制度就是“正”。因此，他只准在旧教育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改良，不准彻底打破旧教育制度的框框。谁超过了一步，谁就是“过正”。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旧的教育制度，把革命人民束缚在旧教育的界限之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论，不承认有绝对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的稳定状态，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客观事物，总是按照对立统一规律不断发展的，总是经过矛盾双方的斗争，突破原来的界限，由量变到质变，由旧事物变为新生事物。这种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恒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只局限在旧事物、旧秩序的界限内，只讲量变，不讲质变，只搞改良，不搞革命，旧事物就不会灭亡，新事物就不可能产生。解放以来，在教育领域里，资产阶级专了我们十七年的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十七年，旧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没有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就不能冲破旧势力的罗网，就不可能砸烂资产阶级的“土围子”。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虽然经过几次斗争，也有一些改良，但是，由于教育的领导权把持在刘少奇一伙手里，他那个“基本照旧，可加若干改良”的修正主义框框始终没有被突破，

只有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亿万革命群众的矫枉必须过正的斗争，才从刘少奇一伙手中夺回了教育阵地的领导权，粉碎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砸烂了旧的教育制度，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才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千真万确的革命真理，决不是邓小平所能抹煞的。

邓小平耍弄的折中主义诡辩论，象游蛇一样，回旋于“这一方面”和“另一方面”之间，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倾向性，但实际上，折中主义并不折中。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折中主义诡辩论者始终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的。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尽管邓小平想用折中主义诡辩论手法掩盖自己，但折中主义终究不是辩证法，毕竟掩盖不住他反党、反人民的真面目，挽救不了他彻底垮台的下场。

“七·二一”道路不容否定

中共衡阳探矿机械厂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猛烈冲击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它象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

在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耀下，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继我国第一所厂办大学——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诞生以后，不同类型的七·二一大学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国，越办越好。各种专业学校坚持走“七·二一”道路，教育革命取得丰硕成果。实践证明，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是一条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必由之路，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出于资产阶

级的本性，站在反动没落阶级的立场上，对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坚持走“七·二一”的光辉道路恨得要命，胡说什么“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个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公然否定“七·二一”指示的普遍意义，妄图扼杀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恢复资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为他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就办学的形式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七·二一工人大学坚持“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一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正确途径，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教育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这些，不仅七·二一大学要做到，各类学校都应该这样做。邓小平凭着他反革命的经验，知道要直接反对我们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已经不行了，于是就玩弄诡辩论，以所谓“不是唯一形式”为幌子，来否定“七·二一”道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所以，我们与邓小平的分歧，决不是什么“形式”之争，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邓小平对七·二一大学如此仇恨，对“七·二一”道路如此害怕，正说明七·二一大学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走“七·二一”道路好得很！

走“七·二一”道路，好就好在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这有利于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使教育这块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变为反修防修的前哨阵地。这也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最为恐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教育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在学校疯狂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使旧大学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广大工人说：“那时候的大学，我们劳动人民的子弟很难进得去，进去了也很难回得来，回来了又很难用得上，和我们不对味，对革命没好处。”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确规定大学要从工农当中选拔学生，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这就为工农群众上大学打开了大门，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学生培养成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提供了可靠保证。我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就是按毛主席这一指示办起来的。在办学中，我们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坚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广大学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去年夏季前后，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奇谈怪论四起，我厂工人大学生立即觉察到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他们顶着右倾翻案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车间和农村，边劳动边作社会调查，写出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的调查报告，贴出了全厂第一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老工人自豪地说：“有这样的大学生，资产阶级再要把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就办不到了。”

走“七·二一”道路，好就好在“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

员”，它有利于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打破资产阶级对技术的垄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对邓小平的所谓“不管白猫黑猫”，依靠资产阶级权威倒行逆施的可耻行径，是一个有力的抨击。我厂文化革命前的技术队伍，几乎都由从学校门进入工厂门的技术人员组成，由于他们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世界观要改造好，理论要结合实际，还有一个过程。七·二一大学的学生来自工农，学习期间不脱离工农，不脱离实践，学了就能顶用。我厂工人大学的第一届学员，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就根据厂里的需要，和工人一起实现了六项较大的技术革新，设计、制造了加工柴油机气缸盖、三个面分头箱等部件的专用设备。当加工气缸盖的那台床子，以提高工效十多倍的速度加工出合格的产品时，工人们高兴地说：“应该在机床的标签上写上，这是我们自己的大学培养出来的技术员设计、制造的，灭一灭那些资产阶级技术老爷的威风！”的确，技术队伍的状况不改变，许多急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就得不到及时解决。就拿我们厂来讲，一些标准件要从浙江宁波等地购来，有时来不及，只好空运回厂。工人们看到这种情况，心痛地说：“能自己设计制造一种简易车床，自己生产厂里需要的标准件，为国家节约开支，那多好呀！”可是，有的人和工人想的不在一个点子上，以这种床子太简单为“理由”，对工人的呼声置之不理。我们的工人学员最理解工人们的心情，他们迎着困难上，主动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工人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十多天奋战，就绘完了车床设计的全部图纸。从现有技术人员当中还可以发现，旧大学最大的弊病之一，就是理论脱离实

际，学的东西在生产中用不上。有个学机械制造的大学生，不知道车床上哪里是刹车，加工产品不知道怎么夹，差点出了大事故。我们工人大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教学，根据生产的实际需要，改变了课程设置，缩短了学制，采取需要什么就学什么的办法。比如制图、工具等课程就提前上，便于学员立即在实践中运用；柴油机修理课程是旧大学没有的，我们按需要增开了这门课。我们还看到，随着现代化的程度增高，工厂需要大批又红又专的技术人员，依靠国家分配，是远远不能满足要求的。我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的第一期学员就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从大学分配到我厂的人数总和。照这样办下去，我们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就解决了！无产阶级剥夺资产阶级的技术优势，永远牢牢地掌握技术大权就办得到了！

走“七·二一”道路，好就好在学员“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它有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这对邓小平极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恢复旧大学、培养精神贵族的复辟阴谋，是一个彻底的批判。旧大学是资产阶级法权和等级观念严重的地方。因此，有的人把进大学作为捞取个人名利的阶梯，学工的不爱工，学农的不务农。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曾经安排一个大学生下车间当工人，他就感到奇怪地说：“象我这样一个国家备了案的人还去当工人？”一语说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当“官”，不能为民，只能当精神贵族，不能跟劳动人民划等号。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破了几千年来“读书做官”的旧传统，鼓舞我们坚决和“劳心者治人”对着干，铲除旧大学这块滋生

资产阶级的肥沃土壤。广大工农兵学员，大学毕业扎根农村、扎根边疆干革命，当普通的劳动者。我厂工人大学的学员坚定地说：“我们上大学，一不要文凭，二不要工程技术人员的头衔，要的是工人阶级的志气，要的是劳动人民的本色，要的是参加三大革命斗争的真本领！”他们坚持每月回班组参加四天汇报劳动，经常参加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有的回家探亲，还跑到离家四十多里的水利建设工地参加劳动，真正做到了“身上不减油香味，两耳不断机器声”。工人们称赞他们是：“理论学习的骨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技术革新的闯将，攀登科学高峰的尖兵！”

通过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的实践，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灿烂前景，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指引的“七·二一”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金光大道。我们党委成员决心进一步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七·二一”指示，彻底批判邓小平攻击七·二一大学的奇谈怪论，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决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把我厂七·二一工人大学办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阵地，向修正主义作斗争的堡垒，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队伍而努力奋斗。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学校

——驳“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

衡阳市十中工宣队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带头在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提出了“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学校的反动口号。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口号，是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叫嚷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翻版。它们的目的，都是反对党、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我们决不可被“热心科学”之类的词句所迷惑，必须抓住实质，彻底批判。

社会主义学校，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学校从来就是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就必须把学校改造成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历史使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决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完成。因为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懂得怎样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学校。而教育阵地长期被剥削阶级所霸占，剥削阶级偏见和传统势力非常顽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极力在教育战线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很深；学校又是知识分子

比较集中的地方，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学校，就绝对不能离开工人阶级的领导。列宁说，教育部门“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毛主席明确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因此，社会主义学校必须由工人阶级掌权，工宣队必须进驻学校，决不能让“热心科学”而不热心无产阶级革命的人来领导，更不容许所谓“热心科学”的走资派以及资产阶级“权威”篡夺领导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学校，也完全能够领导学校。讲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工人阶级对学校的政治领导，最根本的就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工人阶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最热爱，对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最痛恨。一九七二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有人曾提出要砍掉校办工厂、农场。我们认为，这是关系到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走《五·七指示》道路的大问题，便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办好校办工厂，带领师生试制新产品，克服技术和设备上的重重困难，用土办法制出光学仪器，坚持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一九七五年秋，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制造和散布种种奇谈怪论。我们认为，这是在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必须坚决顶住。队员们说：“走‘五·七’道路，是毛主席讲的，哪个要反对，我们就要和他斗。”并建议党支部把高中毕业班拉到校办农场搞半耕半读，把农场扩建成农村分校，为我校面向农村开门办学打下良好基础。正是

由于我们工宣队在党支部领导下，坚持贯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使我校教育革命健康发展。

邓小平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攻击工人阶级“不热心科学”，不能领导学校。他所说的“热心科学”，戳穿了，就是要热心搞“智育第一”，就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政治第一。我们工人阶级对那一套岂止不热心，而且要坚决抵制彻底批判。我们懂得，“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按照这一马列主义原则，我们领导学校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转变学生思想摆在首位，把学生培养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几年来，我们在党支部领导下，工作中做到了三个坚持：坚持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坚持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不断提高学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坚持开展反腐败教育，增强学生防腐拒变的能力。一九七五年在反腐败教育中，我们共找学生谈心一千一百多人次，使一些后进学生有了显著进步，六个班改变了后进面貌，其中四个班被评为先进集体。初二有个学生，受阶级敌人腐蚀，沾染了坏习气。在反腐败教育中，工宣队指导员亲自找他谈话一百多次，多次与家长密切配合进行教育，并与街道民兵组织取得联系，挖出了两个教唆犯，把这个学生教育过来了。说热心，我们工人阶级就是热心狠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邓小平攻击工人阶级是“外行”，无非是说工人阶级“没有文化”，“不懂业务”，似乎只有那些资产阶级老爷才有“知识”，才懂“业务”。他根本不懂得，劳动人民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

会的斗争实践的主体，如果没有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几千年来，剥削阶级凭借他们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剥夺了劳动人民掌握文化科学的权利。现在，毛主席让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握教育大权，使被反动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了，这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合乎人民的需要的伟大战略措施。实践证明，我们工人战斗在三大革命第一线，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丰富经验，我们最清楚，哪些知识是三大革命中有用的，哪些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在领导教学改革时，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考虑问题，使开门办学的路子越走越宽。一九七五年上期，为了使教学很好地为农业学大寨服务，我们把高一师生带到挂钩队搞开门办学。数学课结合田园建设，讲小平板测量，组织学生测量全大队的田土山水，绘制了大队平面图，为贫下中农重新安排河山提供了资料。化学课讲土壤分析，对大队的田土进行土壤普查，为改良土壤提供了依据。这个队根据师生分析土壤的结果，进行了改良土壤试验，试验田平均增产百分之二十。今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我们带领高二师生到衡阳酒厂进行阶段教学，半工半读，结合化学课教《农副产品加工》，结合数学课教《识图》。酒厂党支部书记亲自组织七个师傅成立讲师团，给学生讲阶级斗争、革命传统、生产技术和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使学生普遍掌握了酿酒的基本操作技术和识图的一般常识。不少教师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政治上受到了教育，

业务上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一致认识到，“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纷纷表示要虚心向工农兵学习，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争取做工农兵所欢迎的知识分子。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就是好。

邓小平鼓吹的“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的谬论，完全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唯心史观。它的出笼，从反面告诉我们：修正主义仍然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学校这个阵地，无产阶级占领与资产阶级反占领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不但不能有丝毫削弱，相反还要大大加强。我们工宣队决心不辜负阶级的委托，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定“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为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努力作战。

否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就是反对农村教育革命

衡阳市长湖公社一中贫管会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什么“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学校，妄图扼杀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领导和管理学校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学校的统治。对邓小平这一谬论，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彻底批判。

毛主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在阶级社会里，学校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工具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执行哪个阶级的政治路线，就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统治了学校，把学校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王国”。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那时候，由于贯彻了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虽然办在农村，但不向贫下中

农开门，还用种种借口打击、迫害我们贫下中农子弟。长湖大队第一生产队就在学校旁边，应该说这里的贫下中农子弟入学有条件。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个有二十几户贫下中农的生产队，仅仅有一个贫下中农子弟读完了小学，其余的不是被拒在学校门外，就是被“脑子笨”、“成绩差”等种种“理由”赶出学校。那时候，学校宣扬“智育第一”、“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我们贫下中农子女即使入了学，“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有的学生读了几年书，就看不起农村，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看不起生他养他的父母，个别的还滑进了资产阶级泥坑。金星大队有个学生，家里祖祖辈辈受压迫，三代人没有进过学校门。我们贫下中农是多么盼望这样的“苦瓜苗”能好好学习，接好革命的班啊！可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他不关心无产阶级政治，只埋头读死书，被封、资、修的思想侵袭腐蚀，后来堕落成了反革命分子。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实，充分说明学校不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大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贫下中农就不可能在文化上得到彻底翻身，学校只能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毛主席的伟大号令下，我们贫下中农派出自己的优秀代表组成贫管会，和革命的师生员工一道，夺回了教育大权，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从此，学校的斗、批、改步步深入，教育革命蓬勃发展。

过去，学校脱离党的领导，天天喊发展教育，可是喊来喊

去，喊了十七年，还只有七个小学班、三百四十个学生，学龄儿童有半数不能入学。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在重点普及小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中学教育。几年时间，将学校由小学发展成为有千名学生的九年制学校，在六个大队普及了初中教育。这难道是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学校能办得到的吗？

过去，学校关门办学，与世隔绝，农村三大革命轰轰烈烈，学校这个“土围子”里死气沉沉。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后，带领师生走“五·七”道路，实行开门办学，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炼思想，学知识。学校还办起了工厂、农场，初步建立了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同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紧密结合。这难道是旧学校密封得像罐头那样的课堂里能够做得到的吗？

过去，学校大搞“智育第一”，培养出来的学生名利思想重，轻视工农，鄙视劳动，不热爱社会主义农村，即使留在农村，也不能很好为农村三大革命服务。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八年来，我校有三届高中学生共二百三十四人毕业。他们在学校里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毕业回队后认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步很快，现在二十多人被选为大队、生产队干部，六十多人担任大队、生产队政治夜校辅导员，八十多人成了拖拉机手、电工、植保员等农业技术人员，二十四人担任了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共一百七十六人光荣地加入了党、团组织。他们铁心务农，站在农村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第一线，坚持斗资本主义，干社会主义，是农业学大寨的生力军；他们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这样大批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难道在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旧学校里能够培养得出来吗？

过去，教师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三大革命实践，脱离工农群众，“手脚是白白的，身子是懒懒的，脑子是空空的”，与我们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我们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以后，认真组织他们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引导他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世界观，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革命理论，一起批判修正主义，一起大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一起战天斗地，身上有泥，手上有茧。贫下中农说：“现在教师的心和我们贴得紧了。”这难道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旧学校能够办得到的吗？

看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学校的深刻变化，看到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贫下中农和革命师生打心眼里高兴。大家说：“贫下中农掌文权，学校旧貌变新颜！”这些变化，充分显示了我们贫下中农在教育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也是对邓小平的有力批判。

邓小平还恶毒攻击我们贫下中农“不热心科学”，是“外行”，没有知识。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什么是知识？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

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真正有知识的究竟是谁？不是啃过大部头书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是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毛主席表扬的肖楚女，不但没有进过洋学堂，连私塾也没有上过，却能写很漂亮的文章，当时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我们贫下中农，对旧学校教学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确实不大懂；搞修正主义那套，我们确实是“外行”，不但不“热心”，而且要坚决反对。可是我们亲身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每天都在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有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比起知识分子来要高明得多。我们公社农场老贫农王盛福，过去没有进过学校门，但他搞果树栽培管理蛮有一套，被人们称为“土专家”。他讲课，学生一听就懂，一做就会，这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课时“理论一大篇，实际不沾边”，学生越听越玄，形成鲜明对比，效果完全两样。铁的事实证明，贫下中农不仅能够管好学校，而且能够把讲台。毛主席相信我们贫下中农能够领导好农村教育革命，我们贫下中农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邓小平妄想把我们赶出学校，妄想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学校，垄断讲台，一千个一万个办不到！

邓小平叫嚷“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他究竟要谁来领导呢？让我们从他的反动言行中来找答案吧！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不久，不是摆出“还乡团”的架势，到处请“隐士”、举

“逸民”，叫嚷要把那些“横下一条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扶上台吗？一语道破了天机，他要的是电影《决裂》中曹仲和那样的“办学专家”，那种挂着共产党员的牌子，实际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党内走资派！邓小平不是叫嚷要把同他们一致的“有水平”、“有知识”的人“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吗？这就说明，他要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邓小平叫嚷“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学校的时候，社会上一小撮阶级敌人就攻击说：“泥脚杆子只熟悉犁耙舂碾车，不懂得纸笔书砚墨，哪能管好学校？”个别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得意忘形，说什么：“政治上听贫管会的，业务上还得听我的。”这就充分说明，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失败，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企图利用教育领域的旧传统观念以及他们掌握的知识“优势”，来同无产阶级反复较量，争夺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复活旧教育。他们同邓小平一呼一应，紧密配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这就证明了：邓小平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种种反动言行，集中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和愿望。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牢固占领和彻底改造教育阵地，是一场艰巨复杂的、长期的斗争，不仅要跟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狠狠斗，更要跟党内走资派不断斗。我们更加坚定了战胜走资派以及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的信心。

毛主席早在一九二七年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就尖锐地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邓小平如此拚命地

否定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是反对农村教育革命，妄想把我们社会主义学校，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修正主义邪路上去。他企图开历史倒车，阻挡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前进车轮，只能落得可耻的失败下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掌文权，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使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一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带领师生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去夺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反复学习《实践论》

深入批判攻击开门办学的谬论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工农兵学员 刘智明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大刮右倾翻案风，在教育界制造种种奇谈怪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诬蔑开门办学是“不要理论”、“不讲学文化”，是“实践——实践——实践”。开门办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遭到如此恶毒的攻击，我们工农兵学员决不能容忍！

我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锐利武器，对攻击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的谬论，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和批判。

要批驳这个谬论，首先就要弄清开门办学是怎样处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学习了《实践论》，使我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真正解决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它指出：认识紧紧依赖于实践，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认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认识的目的是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

往复以至无穷。开门办学，正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条认识路线，通过实践学习理论，增长才干和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实践丰富和检验我们所学的东西，并且把学到的理论再运用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这决不是什么“不要理论”、“不讲学文化”，而是把理论和实际、认识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开门办学的过程，就是“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邓小平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把开门办学诬蔑成“实践——实践——实践”，正说明他们根本不懂开门办学的意义，根本不懂“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他们是不读书、不懂马列的修正主义分子。我就用这个认识，写了一份批判稿。

事后，我感到只是从开门办学的意义上批，还不够有力，就第二次学习了《实践论》。毛主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究竟谁掌握了真理，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我们决不能听信奇谈怪论制造者的胡言乱语，而要让事实来说话。我回顾我们班去年先后五次奔赴三大革命第一线，开门办学，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不仅受到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转变了思想，锻炼了作风，并且掌握了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学到了在校内学不到的东西。同学们说：“开门办学就是好，硕果累累抹不掉；路子越走越宽阔，革命大道走定了！”邓小平和奇谈怪论制造者不顾客观事实，瞎说一气，他们的言行，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他们手中没有真理。

批判稿写到这里，有的同志问我：“他们这些家伙为什么要在开门办学上大做文章呢？”这使我感到，还应该使批判深入下去，不能就事论事，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于是，我第三次学习《实践论》，对毛主席关于“**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一教导，进行了反复学习和深入领会，认识到，承认还是否认、坚持还是反对实践第一，是区分辩证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试金石。运用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去剖析奇谈怪论，使我明白了两个问题：第一，他们攻击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说明他们要的是“关门——关门——关门”、“读书——读书——读书”，这就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我们开门办学是注重实践，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论基本观点。第二，他们用“实践——实践——实践”的荒谬公式来攻击开门办学，这不正暴露了他们害怕实践、不要实践、反对实践第一这个辩证唯物论基本观点吗？他们攻击开门办学，就是搞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们是十足的反动唯心论者。从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围绕开门办学的斗争，并不是方法之争，而是一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还是搞唯心主义认识路线的原则斗争。因此，我进一步针锋相对地从思想路线方面狠批了这个奇谈怪论。

这时，我感到批判比以前又深了一步，就把稿子拿到同志们中间去修改。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个奇谈怪论的要害又是什么呢？我就第四次学习《实践论》。毛主席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

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毛主席这些教导，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凡是宣扬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都必然是把历史车轮向后拉，开倒车，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家伙；凡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开倒车、搞复辟的反动派，都必然会捡起唯心论这个破烂货，当作他们的反动思想武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办学道路问题上，否认实践第一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否定开门办学，否定教育革命，就是要翻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案，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如果依了他们，取消开门办学，恢复关门办学，搞那个“三中心”，学生成天被锁在高楼深院，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死记硬背那些“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所谓“知识”，越读得多，思想必然越修。十分清楚，他们攻击开门办学是“实践——实践——实践”，其罪恶目的就是为“复辟——复辟——复辟”：在办学道路上复辟关门办学老一套，在教育战线复辟“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最后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个奇谈怪论是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一脉相承的，要害都是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就是走老路、开倒车的复辟狂。这样一学一批，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反动思想路线是为他们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从“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中派生出来

的奇谈怪论，是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纲领服务的。

认识了它的要害，我感到还要继续战斗，特别是要搞清楚邓小平否定开门办学、否定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复辟的阶级根源。于是，我第五次学习《实践论》。这次我是从两个方面来搞清这个问题的。第一，学习毛主席关于“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的教导，使我懂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每一个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打有阶级的烙印。孔老二大搞“克己复礼”、“学而优则仕”，主张关门读书，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奴隶主贵族；刘少奇、林彪继承孔老二的衣钵，搞复辟倒退，鼓吹“读书做官”、“闭门修养”，散布什么“劳动惩罚”、“下乡镀金”、“变相劳改”等谬论，是由于他们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邓小平是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而顽固地坚持反动阶级的立场，走剥削阶级的老路，搞翻案复辟。第二，学习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关于辩证唯物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即阶级性和实践性的论述，使我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并且运用它来指导三大革命实践。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个锐利武器，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能动地认识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是符合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去认识世界，而只能顽固地按他们那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他们不仅否认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而且非常害怕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导下，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我们实行开门办学，千百万青少年在实践中学习，成长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成长为坚强的反修防修战士，不正意味着他们这伙反动派的灭亡吗？他们要作垂死挣扎，因而跳出来攻击开门办学，妄图复辟关门办学老一套，使学生成为他们搞复辟的殉葬品。邓小平的拙劣表演，只是彻底暴露了他的反动阶级立场，暴露了他和一切腐朽没落的阶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仇恨！

在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不断批判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斗争一点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要在政治上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只有学得好，才能批得深。我决心继续认真学习，努力战斗。

贫下中农的鉴定

对“今不如昔”论的有力批判

衡南县一中党支部

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组织全校师生到向阳、云市、黄狮、廖田四个公社的二十五个大队，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贫下中农用大量的事实，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后九年的教育质量，旗帜鲜明地作出了鉴定。他们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看过，后九年我们干过，教育革命的好处，我们清楚不过。”贫下中农的话，对邓小平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罪行，对他攻击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是极其有力的批判，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翻案活动的反动实质，推动了我校教育革命大辩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向纵深发展。

“现在的学校才真正是我们的”

看教育质量，首先要看学校为哪个阶级服务，是哪个阶级专政的工具。文化革命前十七年怎么样呢？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认为，那时的学校不是无产阶级的。云市公社一位八十三岁的

老贫农说：“我经过三个朝代，亲眼看到旧社会学校是地主老财当权，真是‘校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阵，我们贫下中农子女入了学，变了样，学不好，用不上，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只有文化大革命以后，在毛主席教育路线指引下，学校才真正是我们的。”可是，邓小平却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也有很大成绩”。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完全是瞎说！文化大革命前学校挂的是社会主义牌子，走的是资产阶级路子，卡的是贫下中农脖子，培养的是修正主义苗子。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我们的子女看成‘木脑壳’、‘淤泥巴’，实行一关、二卡、三拉。这对资产阶级来说是成绩，对我们贫下中农是祸害。”他们用具体事实揭露了“十七年”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罪行。大园大队有个贫农的儿子在一九五九年升学考试时，因为穿着不“整齐”，赤着脚进考场，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有的贫下中农子女虽然入了学，但由于不愿爬成名成家的“宝塔尖”，不买“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帐，过不了“考试关”、“分数线”，被赶出校门之外。据查证，我们学校一九六三届共招收二百七十五名高中生，到毕业时只有一百一十四人了，百分之五十九的学生被种种“理由”卡出了学校；留在学校读书的，也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思想被腐蚀，身心受摧残，感情起变化，甚至被资产阶级拉向“白专”道路。他们生在农村不爱农，学了文化忘了本，有的竟嫌父母太“土气”。贫下中农痛心地说：“旧学校真是个黑染缸，我们的子女到里面滚了几年，就成了别家的人了！”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

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铁的事实，使广大师生深刻认识到，“十七年的”学校，在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确成了资产阶级的“土围子”。从学校性质、办学道路、培养目标到教学内容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这样的学校，只能起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哪有什么“成绩”可言呢！

文化大革命后，遵照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进驻了学校，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执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贫下中农子女可以优先入中学，上大学；学生毕业回乡后，阶级斗争牢记心，扎根农村干革命，身强体壮思想红，学了知识就能用。贫下中农兴奋地说：“前后对比，两条路线、两种制度、两类学校黑白分明。文化大革命前，学校由资产阶级统治，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受害受气；现在工人阶级领导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扬眉吐气。邓小平要为前十七年贴金，给后九年抹黑，我们要同他斗到底！”

“现在的学生和我们心连心”

看教育质量，必须看把学生培养成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在调查中，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指示，对文化大革命前后毕业回乡的学生，作了比较全

面的鉴定。他们说：“现在教育质量就是高，高就高在学生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能和我们想在一条线上，走在一条路上，奋斗在一个目标上，和我们心连心。”据向阳公社的调查，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我校毕业的三百六十二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扎根农村，铁心务农。他们认真学习马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现在有三十六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百零八人加入了共青团，绝大多数担任队里理论学习辅导员和政治夜校教师，成为建设大寨县的闯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红旗大队七三届高中毕业生陈云吉回乡后，第二天晚上就主动参加大队民兵巡逻，发现一个富农分子偷枕木，便立即抓送车站进行批斗。团结大队刘弟新同学一回队，便积极投入学大寨运动，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他看到阶级敌人煽动扩大自留地，瓦解集体经济，便和贫下中农一起狠斗阶级敌人，狠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并帮助自己的父亲、叔伯提高觉悟，主动退出多占的集体土地。一九七四年冬，为了重新安排队里的山山水水，他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青年突击队和贫下中农一道改河造田，披风戴雨奋战了一百二十多天，重担子抢着挑，危险活争着上，被群众誉为“大干社会主义的尖兵”。一九七五年秋天，贫下中农推荐他上大学，公社党委提名让他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同一天内，他接到两个通知。党支部征求意见，他果断地说：“农业学大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我参加工作队，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锻炼，为普及大寨县献一分力量。”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弟新这孩子一心贴在

农业上，好得很！”现在，他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去年从我校农技专业班毕业的杨西祥同学，在队里看到禾苗有异常迹象，就细心检查，验实数据，查出是钻心虫暴发的先兆。他及时向大队报告了虫情，并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和贫下中农一起配制出一批土农药，扑灭了一场严重的虫灾，为发展集体生产，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作出了贡献。贫下中农说：“现在的学生阶级斗争是好手，科学种田是里手，我们有这样的人接班放得心！”

文化大革命以前又怎么样呢？贫下中农说：“旧学校出来的学生，和我们对面讲话隔座墙，想的做的不一样。他们在学校读的是‘书、书、书’，想的是‘家、家、家’，讲的是‘官、官、官’，追求的是‘钱、钱、钱’。走出学校后，既不想做工，更不愿种田。讲空话，一大串，讲实际，不沾边。学了物理不会修开关，学了语文开张发票要半天，那样的书读得再多也枉然。”彭池大队有个初中生，毕业回乡后，贫下中农安排他晒谷记帐，可他不会过秤，说是在学校没读过“秤书”，要他抬谷上秤，他却把扁担穿到秤钩子里。贫下中农惋惜地说：“这孩子上几年学，越学越蠢了！”

贫下中农对文化大革命前后教育质量的正确评价，从路线上帮助我们进一步划清了两种质量观的界限。师生们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现在学生从政治思想、路线觉悟到文化水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确确实实是文化大革命前旧学校的学生所不可比拟的。”当然，从“十七年”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实践的锻炼和

工农兵的再教育，多数或大多数是有进步的，有的人并有所发明创造，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邓小平别有用心地把这些归功于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旧学校，以此攻击现在的教育质量，叫嚷“今不如昔”，这只能暴露他翻案复辟的本质罢了！贫下中农的鉴定，邓小平的谎言，使革命师生从正反两方面吸取了很好的教益。

“现在的办学道路好得很”

看教育质量，还必须看办学的道路对不对。在调查中，我们所到之处，贫下中农一致反映：“现在的办学路子好得很，好就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学校落了实，泥脚腿子在学校当了家，开门办学的方向在学校生了根，开了花。”黄狮公社黄石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说得好：“过去的学校，校门关得象铁桶，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党和毛主席撑我们的腰，成立贫管会，我们才有权在学校讲话，有权讨论学校的事情，真是大至方向路线，小到桌椅板凳，我们都要问一问，管一管。”他还向我们介绍了大队小学近几年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一九七二年，社会上刮起“回潮”风，一小撮阶级敌人诬蔑学生学工、学农是不务正业，说什么“要想教学质量高，学农基地不能搞”。结果，小学出现了“关门读死书，坐下攻质量”的现象，学农基地被取消，劳动课被砍掉。贫下中农一看风向不对头，在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发动全校师生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狠批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肃清“智育第一”、“关门

办学”的影响，使教育革命走上了正道，恢复了学农基地，关了的门又打开了。贫下中农深有体会地说：“路线是根本，方向不能偏。只有紧跟毛主席，贫下中农掌文权，学校的路子才会走得正。”

调查中，贫下中农还列举了大量事实，热情赞扬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开门办学所取得的成果。他们说：“现在学校按贫下中农的心意办学，按三大革命的需要办学，让学生到三大革命斗争中去学，我们百分之百地欢迎和支持。”他们一致认为，现在师生走向工厂，走向农村，走向社会，实行小课堂与大课堂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路子正，方向对。廖田公社瓦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们说：“你们学校近几年开设的农机、农技、农业会计、赤脚医生等专业班，培养出大批为农业学大寨服务的人材，这就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起来了。”去年抗旱紧张的时候，这个大队的柴油机坏了，抽水机停了，河里有水抽不上，贫下中农急得很，正好碰到农机班的一个同学回队，同机手一起抢修机器，很快排除了故障。在场的贫下中农都称赞：“这孩子读的书顶用，学校这样办我们赞成！”

贫下中农旗帜鲜明的鉴定，对全校师生员工教育很深，鼓舞很大。我们决心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深入开展教育革命，以实际行动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列宁的教导不容篡改

——学习《青年团的任务》的一点体会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党支部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教育革命的案，不惜亲自披挂上阵，并且指使教育界的走资派制造了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其中之一，就是打着所谓“全面贯彻毛主席教育方针”、“全面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幌子，大肆贩卖“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黑货。他们丧心病狂，甚至不惜引用列宁关于“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教导，来为自己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辩护，达到反对教育革命的罪恶目的。

邓小平打的尽管是马列主义的红旗，也欺骗不了心明眼亮的革命人民；他的伪装再巧妙，也掩盖不了“还乡团”的狰狞面目。他倒行逆施的结果，只能是自己的垮台，而教育革命的洪流将继续奔腾向前，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住的。

—

伟大的导师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

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这个指示，果真能帮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什么忙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列宁的教导决不是修正主义者鼓吹的“智育第一”。

列宁这句话，出自他的名著《青年团的任务》。列宁这篇五十六年前向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演说，继续阐述了他早前提出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光辉思想，明确指出旧学校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说：“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有全面教养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他还指出：“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强迫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列宁对这种搞“智育第一”的旧学校，坚决主张“加以根本改造”。他说：“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打破旧学校的决心”。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中的这些光辉思想，是任何人篡改、抹煞不了的。我们只要认真地学习，就可以看出：邓小平以及教育界的走资派极力恭维的“十七年”教育，本质上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旧学校；他们喋喋不休地叫嚷的“全面关心”和“全面贯彻”，正是要造就资产阶级“有全面教养的人”；他们极力宣扬的“文化”，正是列宁反对的每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他们制造和散布的种种奇谈怪

论，正是反对列宁坚持的要对旧教育“加以根本改造”，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他们歪曲列宁教导的罪恶目的是反对教育革命，妄图使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死灰复燃。

不仅《青年团的任务》通篇的光辉思想，是邓小平一伙篡改、抹煞不了的，就拿“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句话来说，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什么是“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毛主席教导我们：“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很明显，列宁所说“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决不是他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反复指斥的那种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决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所有书本知识堆在一起的杂货摊，而只能是过去一切知识结晶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能是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正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包括自然科学。它不但指导我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指导我们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由此可见，“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的结晶，就是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我们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首先要学习人类知识

的结晶和典范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列宁强调青年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毛主席也经常教导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邓小平一伙歪曲列宁的教导，将“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这句话，拿来为自己鼓吹“智育第一”辩护，妄图使我们的学校，“象旧学校那样，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这就充分暴露了邓小平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年青一代的险恶用心。

二

用人类创造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的头脑”，决不是兼收并蓄。按照列宁的观点，对于过去的知识，一定要以批判的态度去学习。列宁教导青年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列宁在这里提出的“批判”、“改造”原则，正是无产阶级对待旧文化的根本态度。因为各种思想、知识，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无不受到当时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批判、改造旧文化的光辉榜样。“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我们每一个革命同志，一定要站在“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高度，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过去的文化进行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如同人们对于食物进行口腔咀嚼与肠胃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使之分解、消化那样。如果不区别精华与糟粕，就确定不了是取排斥还是取吸收的态度。毛主席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对人类创造的旧文化，只有给予这样的革命的批判，才能有所继承有所创新，才能达到“古为今用”，使自己的头脑真正被丰富起来，有助于成长为共产主义者，否则，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囫圇吞枣，像鲁迅所批判的，不蒸馏而饮浊流，不去蹄毛而用牛羊，自己的头脑非但不能被丰富，反而会引起头昏脑胀，肚泻腹痛，甚至会危及生命！

邓小平把“十七年”的教育奉若神物，胡说“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是错误的”。还扬言要“编从三皇五帝到近代的帝王将相戏，才子佳人戏，编它三百六十本，天天演”。他大搞封、资、修的一套，东搬西凑，兼收并蓄。如果依了邓小平，只能提供资产阶级赖以存在和产生、资本主义得以复辟的土壤和条件，培植出头脑被封、资、修黑货“塞满”的修苗子。

三

我们要“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决不能关门读书，死啃本本，而只能在三大革命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在实践中学习，在斗争中读书。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尖锐指出，书本与生活实践脱节，

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他在回答“怎样学习”的问题时明确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学习、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称号。”“只有在劳动中同工农打成一片，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是整个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客观规律。它告诉我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人的正确思想、真知和才干等，归根结底，都是从社会的三大革命实践中来的，从直接经验中发源的。你要知道革命的道理和方法，就得参加改造世界的革命，你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总之，人们要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通过投身三大革命、接触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手；人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觉悟的提高，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才能逐步实现；完全有用的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掌握和提高。

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级各类学校大搞教育革命，实行开门办学，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与社会血肉相连，一代新人健康成长。对此，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无不拍手叫好，而邓小平和教育界的走资派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什么“开门不学”呀，这表明他们要的无非是“关门死学”这条地主资产阶级办学的老路！

什么“不象样”、“不正规”呀，这说明他们想的仍然是地主资产阶级旧学校的样子观和正规化！所有这些，不是对列宁教导的背叛，又是什么？

邓小平和教育界走资派篡改、背叛列宁教导的卑劣行径，是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祖师爷凯洛夫的故伎重演。凯洛夫搜罗资产阶级教育学派破烂，拼凑了《教育学》，他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第一，又不敢再公开提资产阶级政治第一，只好煞费苦心地制造一个“智育第一”的幌子，来掩盖他极力推行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的本质。他为了将这种“修”字号货物推销出去，又进而盗用马列的词句，往自己脸上贴金，当作他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他通过鼓吹“智育第一”，把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由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变成了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邓小平他们重操凯洛夫的故伎，使出折中主义手法，抓住列宁教导中“知识”这类词，利用目前教育界还严重存在的资产阶级偏见，进行“抽象推论”，就是妄想蒙蔽一部分人跟着走，在学校复活“智育第一”，恢复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有比较才能鉴别。一比较，我们便发现邓小平与凯洛夫的手段、目的、本质都惊人地相似，所不同的是，凯洛夫已经为苏修叛徒集团效了犬马之劳，而邓小平的旧戏一出台，就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下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反击得一败涂地，使得他的复辟美梦变成了“一枕黄粱”。

鼓吹“智育第一” 就是篡改党的教育方针

祁阳县大村甸区中学党支部

毛主席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方针，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来的。它规定了我们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和任务，指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坚持还是反对这一方针，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的衣钵，妄图复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大搞“智育第一”，但又不敢公开提出来，于是在教育界制造种种奇谈怪论，胡说什么“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采用折中主义的诡辩术，为“智育第一”扬幡招魂。对此，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以便在斗争中更好地坚持党的教育方针。

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学校必须把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社

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必然激烈争夺学校这块阵地，争夺接班人。我们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要求学校培养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培养一代共产主义新人。为着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学校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否则，就有可能让学生滑向资本主义邪路，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邓小平竭力鼓吹的“智育第一”，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骗人口号。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智育，驾凌于政治之上或者与政治并列的智育都是不存在的。纵观历史，古今中外的统治阶级办教育，都是把政治摆在首位，为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服务。孔老二要维护崩溃的奴隶制，极力鼓吹“以礼为教”；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强迫尊孔读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要叛道离经，封建卫道士贾政就要把他置于死地；苏修叛徒集团，在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时，拚命向学生灌输“有限主权论”、“国际分工论”等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看，反动统治阶级办教育，都从来不是智育第一，而是本阶级的政治第一。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打出“智育第一”的幌子，只不过为了掩护他们大搞资产阶级政治第一罢了！回顾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鼓吹“智育第一”，疯狂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时，不是极力宣扬“天才教育”、“读书做官”、“知识私有”等黑货，公开鼓励青年“成名成家”吗？不是有不少学生被毒害，追名逐利，来自工农，忘了工农，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新的

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十七年”的教训必须记取！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我们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引导学生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在实践中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有效地帮助他们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我校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回乡的五十五人，先后入党、入团的五十三人，二十八人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对修正主义敢批，对资本主义敢斗，对复辟倒退敢顶。大村甸公社庆阳桥大队第八生产队，原来是个比较后进的生产队，资本主义倾向严重。我校学生唐连生毕业回队后，当了生产队长。他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粮食亩产由一九七二年的七百多斤，提高到一九七五年的一千二百多斤。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有了这样的接班人，我们放得心。”试问，如果不狠批“智育第一”，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能培养出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接班人吗？事实雄辩地证明，妄图篡改党的教育方针，扭转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方向，使学校为复辟资本主义培植社会基础，这就是邓小平鼓吹“智育第一”的真实目的。

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必须使学生学到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比较完全的知识，这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迫切需要。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鼓吹“智育第一”，在学校搞“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使理论脱离实际，教学脱离三

大革命运动，师生脱离工农群众。我们学校那时候上政治课，光照书本讲社会发展史，不让学生去参加当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学生学了许多理论，对现实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却分辨不清！那时教学中还强调所谓知识的系统性，植物课不讲当地的水稻等农作物，而去讲什么含羞草、蒲公英，动物课不讲当地的猪和牛，却去讲澳洲的袋鼠，非洲的河马，一句话，就是三大革命斗争需要的知识学生没有学，学生学了又用不上。毛主席对这种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尖锐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狠狠批判了“智育第一”，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按照《五·七指示》实行开门办学，把学校教育同三大革命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提高了为革命而学的自觉性，学到了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的本领。几年来，我校坚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开门办学。政治课和语文课，结合党的中心进行教学。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论《水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师生深入工厂、农村和工人、贫下中农共同学，结合批，为农村培养了一批批理论辅导员，自己也经受了锻炼，接受了教育，成为批判修正主义战斗的一员。自然科学课程紧密联系生产斗争实际进行教学。比如物理课讲内燃机时，和内燃机训练班结合教学，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和操作实践，高中部二百五十多名同学，大多数

能开柴油机，能发电、碾米、抽水，为农业机械化培养了人材。上农业知识化学课，就带领学生与贫下中农、农业技术员一起搞科学试验，帮助社队化验土壤、自制土农药和腐植酸铵肥料，为农业大干快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可是，在邓小平以及教育界的走资派看来，学生在实践中掌握为三大革命服务的真本领，不算学知识，只有死啃书本，才算学知识，只有条条背得多，才是有知识。他们还恶毒攻击我们批判“智育第一”以后“降低了质量”，可见，他们所要的“高质量”学生，就是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精神贵族，是那些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书呆子”、“修苗子”，这就恰恰暴露了他们搞修正主义，妄图使学校重新沦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反动本质。

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必须培养与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逐步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不劳动，是区别劳动人民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显著标志。反映到教育上，是培养劳动者还是培养剥削者，是无产阶级教育同剥削阶级教育截然不同的目标。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学生“**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只有参加集体生产，才能与工农取得密切联系，建立和保持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只有参加集体生产，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实践知识，做到又红又专，能文能武；只有参加集体生产，才能为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旧学校的学生，由于脱离劳

动，脱离工农，容易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侵袭，有的从不爱劳动、看不起工农，到鄙薄劳动、反对工农，成了修正主义苗子。现在，学校实行开门办学，组织学生深入工农，学习工农，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增强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对工农的思想感情。许多学生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毕业后以农为荣，扎根农村干革命，成了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事实明摆着：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出来的学生，政治强，思想好，爱劳动，爱人民，有理论，能实践，放到哪里都顶用，这难道是搞“智育第一”的旧学校能够培养出来的吗？

邓小平及教育界的走资派竭力鼓吹“智育第一”，大肆攻击现在学校“降低了教育质量”，表面看，他们好象对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很关心，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喋喋不休地叫嚷“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就是妄图在“提高质量”的幌子下，麻痹人们的警觉，以便打破缺口，篡改党的教育方针，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同邓小平之争，不是简单地要不要抓智育，要不要提高质量之争，而是要不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斗争。

斗争实践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走资派还在走”，革命派要战斗。我们全校革命师生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闹翻案、搞复辟的罪行，彻底肃清“智育第一”的流毒，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做普通劳动者 永远与工农划等号

衡阳医学专科学校七五级工农兵学员理论小组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批判了刘少奇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教育战线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光辉指示指引下，一批批来自三大革命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豪情满怀跨进了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毕业后又斗志昂扬地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做普通劳动者。他们用实际行动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妄图扼杀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肆宣扬“大学生同普通劳动者不能划等号”的谬论。他同我们的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激烈搏斗，是关系到教育战线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重大问题。因此，对于这一奇谈怪论的反动实质和险恶用心，必须深入揭露，彻底批判。

大学生要不要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它反映了两种根本对

立的世界观。历代剥削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肆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自己标榜成超于劳动群众之上的“智者”、“贤人”和“救世主”，而把创造人类历史的劳动群众诬蔑成“群氓”和“渣滓”。他们大造反革命舆论，宣扬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反动思想，使自己的特权地位合理化，强令劳动群众听任摆布，承受宰割。邓小平反对大学生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是他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世界观的一次大暴露。在他看来，大学生是有学问的“智者”，而劳动者则是愚昧无知的“群氓”，所以，大学生应是高踞人民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同普通劳动者之间不能划等号。这种观点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唯心史观是一脉相承的，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离开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没有历史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历史证明，奴隶制的灭亡，是奴隶暴动的结果；没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就不会灭亡，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能胜利。同样，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也是劳动群众不断进行社会实践的结果。我国历史上的重大发明，都是亲自参加社会实践的普通劳动者搞成的。他们都没有读过多少书，并不是历代统治者眼中的那种有“学问”的人。明朝李时珍总结了劳动人民的经验以及自己的医疗实践，才编写了至今还有重要价值的《本草纲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

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求继续革命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不断推动着社会前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深刻地批判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几千年来被反动统治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邓小平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极力反对大学生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说穿了，就是要否定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妄图把已经翻身解放的劳动人民，重新变成受奴役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这充分暴露了他把资产阶级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本质。

二

学校要不要培养普通劳动者，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根本问题。无产阶级要培养千百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资产阶级却要培养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邓小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妄图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极力反对学校培养普通工人、农民。他切齿咒诅：“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这些奇谈怪论的实质，就是妄图把学校拉回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邪路上去，把学生训练成“**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着培养“红色专家”、“高级建设人材”的幌子，在教育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他肆意兜售“学而优则仕”的黑货，鼓励学生竭尽全力去爬那个精神贵族的“小宝塔”。在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旧医科院校的不少学生，把当“高级大夫”作为奋斗目标。他们轻视农村多发病、常见病的防治，不为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民着想，热衷于研究为城市老爷服务的医学“尖端”，甚至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当成商品，向党和人民讨价还价，要名要利。贫下中农把旧学校培养出来的高高在上的医生称为“太爷”，就深刻揭露了旧教育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各种类型的大专院校坚持走“七·二一”道路，推广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的办学经验；大批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在校期间，就走出校门，参加劳动，坚持实践，经受锻炼，毕业之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做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坚强战士，当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工人、农民。这是教育领域里的一场深刻革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重大成果，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走向共产主义的战略性措施。它有力地说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生动地展示了教育革命的广阔前景。

邓小平反对大学生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宣扬大学只能培养干部、技术员，其罪恶目的，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学校的性质，把学校重新沦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苏修叛徒集团复辟

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学校培养自己的接班人，掌握各个部门的领导权，使红旗落地，国家变色。苏修头目自己供认，他们的“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他们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还有大量的经理、工程师、会计师、“红色专家”，都是由高等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苏修统治集团的基本骨干和社会基础。邓小平反对学校培养普通劳动者，彻底暴露了他要步苏修的后尘，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

三

大学毕业当工人、当农民，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对于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指明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的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造就超越资产阶级法权狭

隘眼界的“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邓小平攻击我们这样做是“超越阶段”，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他如此起劲地反对，恰恰说明我们做对了！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就要逐步扩大共产主义因素，不断削弱资本主义因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这样，社会主义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三大差别，如果不采取逐步缩小的实际步骤，就根本不可能最后消灭。按照邓小平的逻辑，上了大学就不能再当工人和农民，那么，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岂不是永远不能实现了吗？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岂不是永远不能消除了吗？少数特权者岂不是永远垄断文化科学，高踞于工农之上吗？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悲剧岂不是在中国重演吗？

大学生要不要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着切身的体会。我们认为，大学生必须永远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毛主席教导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联系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实践，我们深刻认识到，真正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还得经过长期的努力，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许多方面还不及普通劳动者。我们虽然来自工农，但大多数没有亲身受过旧社会的苦，缺乏革命斗争经验，在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方面，和苦大仇深的工人、贫下中农比较，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开门办学中，有次山洪暴发，河堤涵道穿孔。在这危急的情势下，一个同学只知呼救，贫协主任闻讯赶来，

立即纵身跳入水中，堵住了溃洞，保住了河堤。这个同学联系这件事情，深有感受地说：“贫下中农的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不完的！”邓小平宣扬大学生只能当干部、技术员，就是妄图用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用资产阶级法权诱骗我们背叛无产阶级，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我们工农兵学员，决不容许邓小平的阴谋得逞，决心以实际行动批判他的罪恶行径，坚决同他鼓吹的修正主义谬论对着干，坚定不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送我们上大学，毕业之后，我们要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以春苗为榜样，亦农亦医，“千家万户留脚印，药香伴着泥土香”，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永远做普通劳动者。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滚滚洪流，迎风激进，势不可挡！让邓小平及一切反动派去悲鸣吧！

革命一辈子 改造一辈子

——斥邓小平反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奇谈怪论

衡阳医学专科学校理论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从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出发，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他别有用心地提出：“文化大革命九年了，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现在有没有变化？”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攻击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状况的基本估计已经过时，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反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们认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知识分子确有很大进步，但是，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大量存在，这正是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一个方面，毛主席的估计决没有过时，“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

社会主义社会，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特征，尖锐地给我们提出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努力改造主观世界的重要任务。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中，作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力军的工农，和作为搞资本主义复辟主要力量的走资派，站

在根本对立的两极上。知识分子何去何从？经过党的教育和斗争锻炼，其中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服务的。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由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因此，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下，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能够靠拢工农主力军，成为紧密配合工农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支力量。

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其中多数人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思想打上了剥削阶级的烙印；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但在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培养的。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学校用“读书做官”、“成名成家”、“知识私有”等剥削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引诱他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并使一些工农子弟也逐步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这种状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是矛盾的，不彻底改造，革命工作总是做不好的，同工农总是格格不入的。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不少知识分子整天钻故纸堆，一心做名利梦，把自己的知识、技术当作商品，用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来处理同党的关系，有的甚至与党对抗，成为资产阶级搞复辟的社会基础。实践证明，“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非常重视按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

知识分子，把他们引上革命的轨道，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与此相反，邓小平则极力反对这一改造，其罪恶目的是妄图保持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利用知识分子为他们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效劳。可见，改造和反改造，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知识分子的激烈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改造好了。“**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决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一劳永逸。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需要战胜可能出现的摇摆和反复。因此，我们在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大有进步的同时，又必须清醒地看到，今天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仍然如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所分析的那样，对于马克思主义“**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剖析一下我们自己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表现，就能清楚看出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家，立足点在哪里。在教育革命中，我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往往很不理解，执行起来往往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而对修正主义路线往往易于接受，一句话，习惯于走老路。路线觉悟是对世界观的最好鉴别。我们一遇风浪就左右摇摆，说明在自己头脑中还有一个不小的资产阶级的王国。我们深深感到，只有承

认这种状况，承认大量知识分子未改造好这一客观存在，知识分子才能继续前进。想在世界观改造上领一张“毕业证书”的观点，是十分有害的。邓小平说什么“两头小、中间大的估计现在有没有变化”，这是借事物的发展，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用“肯定”知识分子进步的手法，反对知识分子还要继续改造。邓小平满以为用这种迷魂汤，可以灌得知识分子飘飘然而放松改造，把他们拉回到老路上去。殊不知经过党的多年教育，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懂得“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决不会上他的当。邓小平的阴谋只能是黄粱一梦！

革命在继续，斗争在深入。在越来越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具有更大的迫切性和极端重要性。

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毛主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拚命抓意识形态，抓舆论阵地，总要利用知识分子为他们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比较深的，修正主义在知识分子中也容易找到市场。走资派刮起一阵风，在知识分子中往往掀起一层浪，这决不是偶然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一些知识分子态度暧昧，立场动摇，有的甚至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此后几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都有

类似情况。所以，党和毛主席谆谆告诫知识分子，要充分认识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不断地给我们提出改造旧思想的任务，引导我们投入同修正主义作战的行列。邓小平之所以极力反对知识分子改造，正是妄图利用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资产阶级的联系，为他们搞复辟倒退服务。他从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界开始刮右倾翻案风，到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经济基础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资产阶级法权成了走资派赖以生存的“护身法宝”，他们象地主害怕失去土地、资本家害怕失去资本一样，害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遗余力地保护它、扩大它，并用它诱使人们走修正主义邪路。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只要存在三大差别和反映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知识分子就往往比工农群众处于较“优越”的地位，如果缺乏自觉性，陷于盲目性，就会把这种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弊病”当作“宝贝”，就会自发地倾向于维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走资派有机可乘。这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和认真对待的。在社会主义革命日益深入的今天，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越来越显得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引导知识分子批判“知识私有”、“读书做官”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自觉地从资

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里解放出来。邓小平对批判“知识私有”暴跳如雷，疯狂反对大学生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是他妄图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引诱知识分子走精神贵族老路的罪证。干部进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生当农民、城市医务人员到农村去等大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争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促进派，给了邓小平以沉重打击！

党和毛主席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不仅对我们提出了改造的任务，而且给我们指明了改造的途径，这就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号召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并且把是否同工农结合，作为判断知识分子是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的“唯一的标准”和“最后的分界”。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又多次强调：“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语重心长地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毛主席的教导，给我们指引了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就是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他气势汹汹地叫嚷：“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实质上是妄图把知识分子推向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拉到资产阶级一边。斗争实践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和工农是结合还是分离，不仅关系到知识分子本身的前途，而且是两个阶级谁战胜谁的一个重要问题。

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光辉思想，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实践出真知，群

众是英雄。工农群众是三大革命实践的主体，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工农群众正在大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只有在与工农结合、一起革命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和工农的差距，真正认识到自己不是高于工农，而是远远不及，不论阶级立场，思想感情，劳动态度，生活作风，以至生产技能，都不及普通劳动者，从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把跟上工人、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步伐，作为自己改造世界观的终身任务。我校广大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通过下放劳动、开门办学和巡回医疗，到工农群众中去接受再教育，在改造世界观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大家对照贫下中农一心为革命、一心为集体的崇高精神，感到那种名利思想、“知识私有”观念是十分肮脏的。有的同志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治了贫下中农身上的病，贫下中农治了我们思想上的病。”现在，很多同志积极贯彻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想贫下中农之所想，急贫下中农之所急，送医送药，问暖问寒。为了抢救阶级兄弟，有的主动献血，有的对口吸痰。思想感情变了，治病也就能够从农村的实际出发，“一根针，一把草，疗效快，花钱少”，改变了过去那种“一张处方一只鸡，一个建议一头猪”的现象。实践使我们进一步提高了同工农相结合的自觉性，看到了光辉的前程。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是当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充当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搞资本主义复辟，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遭到可耻失败。他以“关心”为名，反对知识分

子改造，是要把知识分子推进充当复辟资本主义工具的泥坑，成为资产阶级的殉葬品。只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才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要把知识分子团结到资本主义掘墓人的无产阶级大军一边来，“向光明的前途进军”。毛主席殷切地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从一千年后还要革命，一万年还有矛盾的长期性着眼，从“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迫切性着手，革命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迎着阶级斗争的风雨，战胜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逐步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学习鲁迅 全盘改造旧教育

衡阳师范专科学校教师 刘铭璋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一生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反对复古，反对倒退，对反动派进行了长期坚韧的斗争，对摧残毒害青年的旧教育，作过深入的剖析和无情的批判。鲁迅向着阶级敌人奋勇进击、决不中途妥协的彻底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读点鲁迅的作品，对于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在教育战线制造和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教育这块阵地上，同国内外反动势力顽强地斗争了几十年。他深刻地揭露了旧教育反动的阶级本质，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的主张。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从来是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工具。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就拿教育这个工具，对劳苦大众实行专政，可是却千方百计地掩盖教育的阶级本质。孔老二办学，是替奴隶主阶级培养忠实爪牙，为复辟奴隶制度服务的，而他打出的幌子却是什么“有教无类”。后来，地主、资产阶级也接过这个

口号，硬把本阶级的教育装扮成“全民教育”。袁世凯、蒋介石就大谈特谈“国民教育”、“普及教育”。他们的御用文人跟着大造舆论，说什么教育是“清高”的，学校只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场所”。鲁迅是从旧营垒来的，看透了他们玩弄的这套把戏，曾一针见血地揭露出它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指出：旧学校旧文化，从来就是“特殊阶级独占的工具”。

旧教育作为剥削阶级的“独占工具”，主要是通过为剥削阶级培养接班人体现出来的。孔老二办学是为奴隶主贵族训练精通周礼的官僚。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都把“学而优则仕”看成天经地义。子路就说：“不仕无义”，认为读书人不做官，就不合道理。孟轲也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认为读书人当官，同农民种地一样，是理所当然。几千年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办学都秉承孔老二的衣钵，把学校办成制造剥削阶级忠实爪牙和继承人的场所。鲁迅认为，“学而优则仕”集中概括了孔老二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他戳穿关于教育超阶级的一切谎言，告诫人们，决不要相信所谓“三民主义”的“教育普及”的鬼把戏。他愤怒地指出：“劳动者的孩子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

为了贯彻“学而优则仕”的反动教育方针，反动统治阶级必然按照剥削阶级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用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去教育青年。历代反动统治者都推行儒家“礼治”路线，它反映到教育内容上，就是“以礼为教”，鼓吹尊孔读经，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

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鲁迅也曾经尖锐地指出这点，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以外，其余的‘异端’的声音，决不能越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他还在许多文章中揭露：民国以来，袁世凯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孟之道”为“修身大本”，段祺瑞军阀政府规定小学从四年级起就要读经，蒋介石也大力推行“尊孔读经”的复古教育。鲁迅指出，反动派掀起这股复古倒退逆流，完全是为了对抗当时如火如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妄图借助孔丘的幽灵，腐蚀人民，瓦解斗志。他对这股逆流进行了坚决的长期的斗争，对孔丘的虚伪和“经书”的反动本质作了深刻的揭露。他在《十四年的“读经”》一文中说，孔丘本来不愿去见阳货，却“瞰亡往拜”，乘阳货不在家时去拜访；孔丘念念不忘当官，三个月捞不到一官半职，就焦急不安，“出疆载质”，要带着礼物出国去谋官了。鲁迅指出“经书”上讲的就是这一套自欺欺人的“最巧玩艺儿”，教人“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书”教出来的，也就是这样一些维护反动统治的“聪明人”。

反动统治者鼓吹“学而优则仕”，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可以做官；能爬上去的，只是被反动统治者看中的极少数会“钻营、取巧、献媚”的鹰犬，大多数人则钻进了帝王设置的科举制度的圈套，皓首穷经，最后做了牺牲品。这对反动统治者维

护其反动统治是有好处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无成”，道破了其中的奥妙。鲁迅的著名小说《孔乙己》就是揭露这种封建教育制度，讨伐“学而优则仕”的战斗檄文。孔乙己原来抱住“唯有读书高”的信条，企图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爬上士大夫的行列，结果连一个秀才也没有捞到。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穷愁潦倒，仍始终不愿脱去那件破旧的长衫，借以显示自己是个“读书人”，比“短衣帮”（劳动者）要高一等。他这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弱者，最后被统治者丁举人逼上了死路。鲁迅通过孔乙己这个艺术形象，愤怒鞭笞了制造孔乙己这种废物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深刻揭露了复古倒退逆流的反动腐朽的本质。鲁迅对那种弥漫着腐朽没落思想文化和游荡着孔老二幽灵的旧学校，深恶痛绝，大声疾呼：“这学校除全盘改造之外，没有第二法。”这是他对旧教育进行阶级分析后，得出的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结论，充分表明了他对当时整个旧教育制度的根本否定的态度。

解放后，我们从旧社会接收过来的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办的学校。毛主席明确指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顽固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提出了一条“应按过去办法，基本照旧，加以若干改良”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虽说形式上有一些不同，性质上却并没有根本改变，和鲁迅当年提出要“全盘改造”的旧学校没有多少差别，是封、资、修的混合物，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无耻地吹捧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胡说什么“也有很大的成绩”。他这样把“我们的痼疽”当作“他们的宝贝”，就是妄想让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死灰复燃，反对对旧学校进行根本改造，这是我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我们一定要用战斗来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成果，坚持“全盘改造”旧教育，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阶级本质及其反动腐朽的内容，决定了学校采取关门办学、闭门读书的方式，把学生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脱离社会，脱离实践，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板的知识。鲁迅一贯反对脱离社会实践的“读死书”的教育方法，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死读经书的知识分子的愚昧和无知：他们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在“天下事”面前完全是个瞎子。鲁迅辛辣地讽刺道：“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了。（《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有些秀才自以为有知识，鲁迅说：

“古之秀才，自以为无所不晓，于是有‘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这自负的漫天大谎。”“其实是‘秀才虽出门，不知天下事’的。”他揭露脑子里塞满了“经书”的“南海圣人”康有为：“他周游十一国，一直到得巴尔干，这才悟出外国之所以常有‘弑君’之故来了，曰：因为宫墙太矮的缘故！”（《南腔北调集·谚语》）旧学制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十七年，学生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死啃书本，从理论到理

论，从概念到概念，怎能不闹笑话，怎能不变成废物呢？鲁迅尖锐地指出：“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

鲁迅主张读书“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要求青年“用自己的眼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而已集·读书杂谈》），抛开废纸堆，走出校门外，学习社会，投身革命斗争。这既是针对旧学校关门办学的弊病，也是针对当时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说的。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时代。当时的教育领域被反动的孔孟之道、法西斯主义反动思想禁锢得象罐头一样严密。段祺瑞严禁学生阅读“法定”的课本范围以外的革命书籍，严禁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蒋介石更是“捏刀管教育”，对学生实行特务统治，血腥镇压。买办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之流大造反革命舆论，蛊惑青年学生“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踱进研究室”，去“整理国故”。他给青年学生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要他们“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其罪恶目的，就是把学生青年诱离现实的政治斗争，妄图阻挠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熄灭行将烧掉旧中国的革命烈火。鲁迅奋起反击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他提醒青年，胡适之流所开的“一大篇书目”，“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它不过是把青年关进书斋，埋入用古书砌成的坟墓中去的诱饵，他给了“整理国故”的谬论以猛烈的抨击，指出：“整理国故”不过是一种妄图抵制“新思潮”、“抬出祖宗来说法”的反动行为。鲁迅愤慨地指出，“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坟·未有天才之前》）

鲁迅认为，“当前急务之一，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屏弃关门办学和“死读书”。因此，他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青年参加反对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他坚决支持爱国青年的正义斗争，号召青年向黑暗的反动统治进击，向腐朽的旧文化宣战。他写了《狂人日记》，揭发旧社会是“吃人”的世界。他写了《阿Q正传》，从贫苦农民还来不及参加革命就被“革命”把总冤杀，来揭发辛亥革命时封建统治者摇身一变钻进革命阵营“咸与维新”的复杂情况，揭发民主革命派害怕群众、甚至镇压群众的严酷现实，提醒人们：注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明白而勇敢地继续战斗。在“女师大事件”中，他坚定地站在进步青年一边，反对北洋军阀政府迫害青年学生。在“三·一八”惨案中，他愤怒控诉段祺瑞政府虐杀爱国青年的血腥罪行，热情歌颂“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号召“真的猛士”，“更奋然而前行”。在厦门，他支持厦门大学学生改革学校的学潮，使原来象一潭死水的厦大，也起了壮阔的波澜。在广州，他支持中山大学学生的革命活动，鼓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他敏锐地看到革命阵营里反革命的潜流，提醒青年注意革命的动向，指出：广州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沪宁克复后，他又提醒沉醉在庆祝胜利中的人们：“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他号召人们“永远进击”。特别是在“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他眼看到中山大学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学生一

批批遭到逮捕杀害，义愤填膺，不顾白色恐怖，奋起营救被捕学生。鲁迅毕生就是这样以实际行动，鼓励和支持青年“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弄清“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的道理，从而成为勇敢而明白的斗士。鲁迅就是这样把教育与改造社会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使教育工作为革命斗争服务。

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因此，我们当今急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勇敢而明白的反修防修战士。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号召广大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指出青年“要经风雨，见世面，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社会主义学校，应当引导学生经阶级斗争的“风雨”，见阶级斗争的“世面”，培养和资产阶级斗、和党内走资派斗的坚强斗士。可是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头子，却象袁世凯、蒋介石一样，继承孔孟衣钵，大肆贩卖“关门读书”、“闭门修养”的黑货，反对学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刘少奇、林彪的那一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批判，可是邓小平一上台，又刮起右倾翻案风，胡说教育战线“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在他看来，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到农村、工厂去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联系实际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都不算读书。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学生不再关门读封、资、修的书这样的最大好事，说成是教育战线的最大危机，妄想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使学校重新沦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他妄想重新把学生引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

的死胡同，使学生思想变修，越读越蠢，成为修苗和废物。我们必须同邓小平对着干，坚持《五·七指示》道路，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继续搞好开门办学，让学生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